

苏曼殊早年的革命活动

柳无忌原作 李 芸节译

苏曼殊简介: 苏曼殊(1884,9,28—1918,5,2),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南社诗人、脍炙人口的小说家、独具匠心的画家,又是与严复、林纾齐名的“清末三大翻译家”之一。

他是旅日华侨之子。出生不久,非婚生的日本母亲离去,由庶母日本人河合氏抚养。六岁,由嫡母携回原籍广东香山。十五岁,东渡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前,在日本、上海等地与冯自由、秦毓蓁、陈独秀、刘三、章太炎、柳亚子等交往密切,参加革命活动。民国初年,又结识了孙中山等,积极支持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斗争。但因个人“身世有难言之痛”,一生两度出家。民国成立后,又“眼见举世污浊”,日益厌世,竟在三十五岁的壮年不幸早逝。

苏曼殊平生私淑英国的爱国诗人拜伦,因为“他是一个热烈的、真诚的为自由而献身的人”。他在长期旅居日本、飘流南洋时写的不少诗、文、书信里,始终表现了深切的眷恋故土、关心祖国命运的爱国感情。他是一个天才隽逸、多才多艺的作家和艺术家,他的诗歌、小说、散文、绘画和译著,都是中国近代文学艺术遗产珍贵的一部分。现值曼殊诞生一百周年之际,特发表此文,以志纪念。

——译者

二十世纪头十年中,中国的反满风潮达到了顶点。在国内外接受了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的青年学生,成为革命的先锋。这些年青人屡遭失败,无所畏惧。他们在孙中山领导下,为了恢复汉族统治,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这些新的领袖们为了建立一支比较坚强有力的政治拥护者的队伍,就在外国或在国内由外国管辖的能掩蔽他们免遭清政府迫害的城市里建立总部。因此,只要叙述一下东京、上海和香港的情形,就可以说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革命活动的概况。苏曼殊在这三个城市都短暂地逗留过,在这些城市里,他都发觉自己置身于革命队伍的行列之中。

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界,苏曼殊作为一个年青

的、没有经验的革命志士开始进行锻炼。1895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还很少,到了1906年,大概已经增加到一万三千人。人数最多的一批人来自曼殊的家乡广东省,其他来自长江流域的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他们到日本寻求现代教育,却往往成为热烈的革命志士。尽管他们的经历和性格各不相同,但大家都有共同的抱负,要把中国从满清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并且有些人下定决心,一旦推翻了清王朝,还要改革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少学生既有革命热情,又有文学才能,他们创办期刊阐明自己的观点。曼殊在东京的学生时代,结交的正是这些激进分子。

在这群人中,最活跃的人物或许是章炳麟(1868—1936),当时他这个名字要比“章太炎”更为人们所熟悉,他后来成为苏曼殊的密友。

1902年4月上中旬,章炳麟想出一个主意,提议举行中国留日学生集会来激起和增强旅日华侨的爱国主义感情。他本人用典雅的文言文起草了宣言。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全都收到了宣言,有几百个学生准备参加会议。但在中国驻日公使的请求下,这次会被日本警方查禁,只有孙中山等少数同志在横滨的一家饭馆里进行了纪念。

然而,年青的革命志士们的精神是无所畏惧的。为了在共同的事业中结合在一起,他们在1902年冬天成立了“青年会”。这显然是受了玛志尼的“少年意大利”的启发,但是为了不过分引起公众的注意,他们的组织没有采用最初拟议的“少年中国”这更惹人注目的名字。这个团体的创始人大多数都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有叶澜、秦毓蓁、张继、冯自由和苏曼殊。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当时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又是苏曼殊的朋友和同事。

苏曼殊像其他在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一样,也被卷入革命漩涡。他参加了青年会,并且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年青人结交。因此,到1903年初,曼殊已经支持革命事业了。不久,一种为祖国效劳的

愿望,又促使他到成城学校去学军事。成城学校是一所为日本军队培养军官的预科学校。他在那里初次遇见刘三,后来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刘是上海郊区一个拥有土地的富裕人家的儿子,他和曼殊一样,作为一个学生对革命产生了同情。在以后的年代里他继续和革命运动保持联系。他是收到曼殊私人信件最多的人,这些文件被保存了下来。

作为一个学习军事的学生和富有强烈民族感情的青年,苏曼殊又成为1903年4月成立的中国学生的拒俄义勇队一名积极的队员。帝俄图谋中国领土并武装占领东三省,使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警觉起来。他们组织了抗议俄国侵略的活动。有五百多名中国学生出席了由叶澜、秦毓鎰和钮永建召集的会议,钮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军事领袖。约有120名学生签名要求参加拒俄义勇队,另有40人自愿参加义勇队总部的工作。义勇队分三个连,每连四个排,每排由十人组成。苏曼殊编在一连四排。叶澜、秦毓鎰和钮永建编在二连,钮任排长。黄兴(1874—1916)也在二连。有十二名女学生参加了该队。任护士助理。

义勇队成立后还不到十天,日本政府在中国外交官员的要求下出面进行镇压。义勇队的一些勇敢的领导人如叶澜和秦毓鎰等转入地下,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军国民教育会”。该会的会员名单是保密的,但现在已经知道,苏曼殊和黄兴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发起书是由秦毓鎰起草的,它清楚地说明,该会是一个军事组织,提倡推翻满清政府。

为了实施由宣传、起义和暗杀三种手段组成的革命战略,会员们相继启程回国,到他们的故乡开展革命运动。黄兴回长沙,秦毓鎰先回上海,后来应黄兴之邀也到了长沙。几个月后,苏曼殊步他们的后尘,在1903年9月从日本乘船,路经上海,前往香港。

人们一直认为,曼殊是因为经济拮据被迫离开日本的。他当时的革命精神是高昂的,而他的生活却像往常一样,十分贫困。在东京的第一年,住的是最便宜的寄宿舍,吃的是粗米,为了节省开支,他的房间里每天晚上都不点灯。当有人问起时,他回答说:“余之课本,日间即已熟读,燃灯奚为?”不过,他离开日本的主要原因,则是他作为军国民教育会的一个成员,愿望能在祖国积极地参加革命活动。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在他随身携带的东西里面,有一封冯自由写给陈少白的介绍信。那时,陈在香港是孙中山革命党机关报《中国日报》的发行人。

苏曼殊本人离开日本时的感情,流露在他寄给

他的朋友、一个教师的两首诗中:

《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①》

踏海鲁连不帝秦, 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 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 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 一天明月白如霜。

这两首诗都赞颂自我牺牲的精神。在第一首诗中,这位年青的诗人热烈地追慕爱国者鲁仲连的行动。在第二首诗里,曼殊把自己比作古代英雄荆轲,描述荆轲奉命前去暗杀秦王,在易水河畔向朋友们告别的情景,并且隐含着把清朝统治者比作和秦始皇一样残忍和独裁。诗人设想自己是受苦大众的复仇者。

在从日本开往上海的轮船上,曼殊寄给林紫垣一张自杀的通知,告诉对方他要投海自尽。他这个行动的目的,没有人知道。这可以解释为是一种策略,防止他在香山的家族可能因为他要进行的反满活动被牵连。对于他的动机的这种解释,和随后两年中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看,似乎是符合的。

曼殊明确的目的地是香港,但他在上海作了停留,拜访几个比他先到的朋友。在他1903年9月到达上海之前,两个革命作家的被捕,震动了当地的中国知识界。其时,章士钊、吴敬恒担任《苏报》的编辑工作,使它成为传播反政府宣传的工具。邹容自日本回国后在《革命军》这本有煽动性的小册子里,提出自己的革命主张。章炳麟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序言。这篇号召造反的文章,连同其他几篇类似的有煽动性的文章,在《苏报》刊登出来。公共租界里不受政府控制的青年学生和作家们所发起的革命鼓动高潮,使南京的政府官吏十分惊恐,他们要求英国当局逮捕《苏报》的编辑们,并将他们押送中国牢狱。英国当局答应下令逮捕邹、章和其他领导人。邹、章分别被判处二年和三年徒刑。邹容在狱中患病,并且在只要再过几个月就要释放的时候死去,成了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烈士。章炳麟以阅读佛经和古典文学,度过了三年牢狱生活。

随着这个事件而来的是苏报被查禁,但这并未吓住革命志士们,他们在1903年8月又创办了《国民日报》,由章士钊和张继任编辑。撰稿人中,还有和张继同为原东京青年会会员的陈独秀。不久之后,原青年会另一个会员苏曼殊也和这个报纸有了密切联系。当他十月间抵达上海这个出事地点之后,《国民日报》上很快就接连发表了前面所引

的他的两首诗，还有两篇文章，题目是《女杰郭耳曼》和《呜呼广东人！》，以及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第一部的部分译文。这些作品展现了一种粗糙的文体和激烈的语言，这两个方面都反映出作者的成熟（他当时只有二十岁）以及推动着他的那种强烈的感情。

曼殊在《国民日报》发表的作品，主要是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的白话文中译文，他定名为《惨社会》。从1903年10月8日至12月1日，登完了十回及第十一回的上半回。第二年由上海一家出版公司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惨世界》，署名苏曼殊和陈独秀同译。陈当时和曼殊一起在《国民日报》工作，他负责润饰并继续完成翻译。这个中译本共计十四回，仍然只是原著的一小部份。这个译本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拼凑起来的。第一部分是雨果原著第一部《芳汀》中第二卷《沉沦》的自由翻译，考虑到他当时的语言知识，大概是从英文或日文翻译的。第二部分是篇幅相近的新颖的故事，纯粹是曼殊的创作，和这部法国小说几乎没有类似之处或任何关联②。

第一部分叙述法国南部狄涅城（苏译为太尼城）主教查理·米里哀（苏译为孟主教）和冉·阿让（苏译为金华贱）相遇的故事。曼殊毫不介意翻译的忠实性和精确性，他大大地偏离原著，对这位仁慈的主教的品德和行为动机泼上了污水。他对原著作了许多改动，在中译文中将原文整句整段地略去。尽管如此，读起来还是相当流畅。

第二部分中叙事的段落和第一部分不一样，而是更多地依靠叙述技巧。他以很大的热忱讲述自己塑造的一个英雄人物明男德（开明的男人美德）的抱负和冒险的故事。这是一个赋有中国侠士传统特色的现代革命志士，是一个爱打抱不平的英雄，企图纠正世上不公平的事情。曼殊的这个短篇小说，是由《悲惨世界》赋予灵感才写出来的，其中的故事，主要是对传统社会和独裁统治的控诉。它暴露了官吏们的背信弃义和残酷无情——人性中的虚伪和卑鄙。有一段情节描写男德企图暗杀拿破仑一世。身为一个革命会党的成员，男德得知拿破仑想当皇帝，心头不由发火，企图在他加冕之前杀死他。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挖苦地说道：

“我们法兰西人比不得

东方支那贱种的人，把杀害他祖宗的仇人，当作圣主仁君看待。”（《全集》第2卷第243页）后来男德寻思道：“我法兰西国民，乃是义侠不服压制的好汉子，不象那做惯了奴隶的支那人，怎么就好听这乌大总统（拿破仑一世）来做个生杀予夺、独断独行的大皇帝呢！”（《全集》第2卷第254页）男德在拿破仑前往戏院的路途上埋伏了一颗炸弹，但御车迟到几步，炸弹没有炸中。接着男德就开枪自杀了。这个计谋暗杀的故事，以虚构的形式，戏剧性地表现当时中国青年革命志士们的主张和希望。曼殊这个时期的作品反复提出这个主题，和他个人的情绪以及先前在日本的活动是一致的。

有很短一段时间，苏曼殊曾在苏州一个学校任教。但无法确定是在参加《国民日报》工作之前或之后。因为从上海坐火车到苏州只要几小时，所以他也可能是同时兼做两种工作。总之，他在这两个职位上的时间都不长。他在报馆的任期不到两个月，而他在苏州学校任教也许只有几个星期。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即曼殊在这两处工作得到的报酬都不多。因此，尽管他那时写作和教书很忙，仍然像在日本当穷学生时那样贫困。

经济上的压力使曼殊在十二月初戏剧性地退出上海的活动舞台。当时他和章士钊、陈独秀及另一个朋友何梅士住在一起。一天，章和陈外出，曼殊邀请何梅士去看戏。到了戏院，他显然按预先想好的计划，假装忘了带钱，让何留在戏院里，自己回住处去。他拿了章士钊的三十块钱，立刻到码头乘头一条船去香港。他带着早先请冯自由写好的那一封给陈少白的介绍信，到《中国日报》社，在那里找到了临时住处。《中国日报》是孙中山在1899年末作为党的机关报创办的，由孙中山最亲密的朋友陈少白主持。后来接替陈少白担任编辑工作的冯自由，当时是《中国日报》驻东京记者，所以他能够把曼殊作为一个同志介绍到香港。

曼殊在香港的活动，朦胧不清。他似乎过着一种清静的、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不像在横滨、上海



孙中山先生曼殊遗墨题字（萧幼秋藏曼殊画稿手卷之一）

那样广交朋友，也没有使他和陈少白及报馆其他人的关系发展为友谊。他在上海报纸上所显示的文学天才，这时没有发挥出来，没有在《中国日报》上发表什么文字。不知什么原因，他在那段时间里似乎意气沮丧，心情沉重。他既没有得到发挥革命热情的机会，也没有什么写作的冲动产生出成果。他像来到香港时一样，又毫不引人注目地离开香港回广东去。对于他返回故乡的决定有几种解释：既然他离老家这么近，思乡病就促使他回广东去；或者，谋求诸如暗杀一个满清官吏的秘密计划，激发他到广东本土走一趟。这两种说法，好象都不符合事实。因为他旅行的最后的落脚点是广东南部惠州一个年久失修的破庙。他在那里削发当了和尚。从一个目光远大的青年革命志士变成一个乞求施舍的和尚，这种变化是很剧烈的；可能是为了逃避一次已经安排好的婚事的单纯愿望，才促使他这么做的③。

曼殊之进入佛教界，并不象他所说的那样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象他以后的佯装一样，都使人有些感到迷惑不解。他不是在一座大寺院里跟著名的法师学佛经，而是在破庙里过着贫困的生活。他和一个老和尚在一起，每天靠化缘糊口。正是饥饿和贫穷的压力，而不是寺院戒律的严格，致使他乘老和尚外出募化之时，偷了这位师父的二角银洋和已故师兄的戒牒，作为回香港的护照。1904年2月的一天，他身穿袈裟，脚踏芒鞋，重新出现在《中国日报》社里，使同人们大为惊讶。从那时起，他就采用了佛教徒的名字曼殊（出自菩萨曼殊室利的名字），这个名字也就渐渐为同时代的人和后人所熟悉了。

他第二次在香港停留，是在1904年二、三月间，比第一次停留的时间更短暂。3月13日那天他意外地遇见一个从香山来的同乡，把他的消息带回了沥溪。当时他父亲苏杰生已经病重，那个同乡立

即被重新派到香港，劝曼殊回家。他拒绝了。两天以后的3月15日，苏杰生便去世了，享年六十岁。当时他的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曼殊留在香港，照亭在日本神户经商。

在此之前不久，曼殊想要暗杀康有为的计划没有实现。《中国日报》当时正在和康有为改良派的机关报《商报》进行激烈的论战。《商报》是曼殊在大同学校时的校长徐君勉（徐勤）主编的。曼殊对康支持满清政权并效忠于皇帝，极为不满，对改良派在香港的影响正在扩大也感到担心，他要枪杀康有为，显然忘却了他的新的宗教信仰的戒条。但他的谋划被陈少白阻止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宽厚地推测他决心和家庭断绝一切联系，甚至在父亲病重时也不回家，可能是出于担心自己的活动会把他的家族也牵连进去。不过，他从寺院回来后，原先所抱有的革命热情已经冷却下来。在他二十一岁以后，他的注意力已经从政治方面转向教书和写作，尽管蕴藏在他心中革命精神的火花，偶尔还会再次熊熊地燃烧起来。

（译者附记：本文节译自柳无忌著：《苏曼殊评传》英文本，美国纽约特纳公司1972年初版。该书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注：

①汤国顿，大概和大同学校的教师汤觉顿是同一人。

②译注：《惨世界》一书，可说是由两部没有什么联系的小说组成的。第一部包括第一回至第六回和第十四回；第二部包括第七回至第十三回。

③冯自由在《苏曼殊之真面目》一文中，有如下一种说法：“其父杰生早年在乡已为曼殊聘妇，闻子归自日本，遂至港访之，且欲使其完娶。曼殊竟避而不见。少白以为天性凉薄，力劝其从父归乡，曼殊乃不告而行，莫知所往。数月后至港，则已削发为僧，易名曼殊矣。”

编辑者：上海社会科学院
《社会科学》编委会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出版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印刷者：解放日报印刷厂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封面)

国内总发行：上海市报刊发行处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邮购零售处：上海书店期刊部
(上海市福州路338号)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 2820信箱

1984年10月15日出版 定价0.35元